

# 传播“健康”：民族主义、科学现代性与近代中国“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

——一项基于《中华健康杂志》（1939-1949）的考察

李耘耕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立足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下，探究本土医学精英是如何建构并传播“健康”观念及话语的。通过对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1939-1949）中有关健康的话语文本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与经典中医中注重个体和养生之道的“健康”含义不同，“健康”话语在近代语境中超越了个体的意义，更多地与“民族主义”话语相勾连，进而成为本土医学精英实现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目标相结盟的话语武器。另一方面，“健康”话语作为“科学现代性”的表征，它被用来传播与宣扬现代医学的普适价值。在本土医学精英的话语操弄下，“健康”成为“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中介性话语。由此，现代中国的“健康”话语承载了本土医学精英利用公共卫生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目标以及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和“科学现代性”的传播目的。

**【关键词】**健康；话语；《中华健康杂志》；民族主义；科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在1939年8月出版的《中华健康杂志》发刊词上，时任主编的黄子方<sup>[1]</sup>医师这样写道：

“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无疑的就是须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必须病魔不侵，精神奋发，体格强健，总可以谈得到幸福。……我们知道公共卫生的进步，是政府和人民双方合作的结果。无论政府对于医疗设备和卫生行政如何的努力，倘人民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智识莫名其妙，仍必致徒劳而无

**【作者简介】** 李耘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交媒体语境下精神疾病污名化话语的网络传播与干预机制研究”（19C10272030）的阶段性成果。

功……身体健康最后关键仍在乎人人对于防病，保健，营养，卫生均有根本的智识，无疑的信任，毅力的实行，方可以成功。”（黄子方，1939：5）

此时，距离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本土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已经过去14年。中国本土的西医学家们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公共卫生教育计划，在这个教育计划的蓝图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办刊。在中华医学会的鼎力支持下，1939年8月15日，《中华健康杂志》应运而生。这份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以健康命名的全国性卫生和健康普及期刊，成为了中国本土医学精英在近代传播健康观念的先锋。

尽管早在《中华健康杂志》之前，西方的现代医疗和卫生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生根发芽，但是面向大众传播的健康类期刊却付诸阙如。虽然不是第一份以“健康”为题的杂志，<sup>[2]</sup>但《中华健康杂志》却在中国的健康传播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它是近代中国（1840-1949）最长命的以“健康”为主题的期刊；其主办方和作者大都是本土的医学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健康杂志》是中国近代健康传播的典范刊物，对它的研究于今天中国的健康传播也有追根溯源的意义。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于“健康”话语的观念史研究付诸阙如。但与“健康”话语类同的是，Rogaski考察了“卫生”一词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含义变迁。“卫生”脱胎于中医经典的“养生”理念与整体论的宇宙生命观中。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一套以“气”为核心，比欧洲更为复杂的养生理论体系。在西医传道最初深入中国之时，他们的医疗技术和卫生观念并不必然强于中国（Rogaski，2004）。也因此，西医最初在中国的推广举步维艰。更有中国的普通群众，将西医传道士视为会将婴孩偷走，剖心挖骨的恶魔（杨念群，2006）。然进入近代以后，西医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20世纪初，细菌学说在西方出现，卫生的重点从环境重新回归身体，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突破性掌控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卫生防疫的理念生根发芽。义和团运动之后，八国联军进驻天津组成临时政府，西方殖民者将卫生防疫视为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卫生”成为中国落后的一个话语表征。因此，Rogaski言道：“卫生是最初由殖民者锻造的民族主义的派生话语。”（Rogaski，2004）现代医疗和卫生观念在近代的传入是中国健康传播史的大事，然而与“卫生”观念不同的是，虽然“健康”的词汇古今有别，但指涉个体健康的观念和话语在中医和中国经典中却不乏其例。然而现代“健康”观念却不仅仅是一个指涉个体健康的话语，它还关涉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水平高低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备与否。杨念群曾经指出：“传统医疗框架里，疾病发生的‘道德隐喻’往往只与个人有关，顶多宗族与村社相关”。而到了现代之后，“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杨念群，2006：428）。也因此，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健康”观念和话语的嬗变，是一个能够窥

探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隐秘或被熟视无睹之话语的捷径。这些话语的建构，常常通过精英办刊的形式出现。“健康”作为一种共识的出现，也得益于近代以来本土医学精英的着力推广，这种推广首先是以办刊的形式实现的。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也浮出水面：本土的医学精英为什么要致力于办刊传播和推广健康的理念；作为医学术语的“健康”话语在近代中国承载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而“健康”话语的传播与近代中国卫生和医疗体系现代化以及现代国家的建构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将让我们突破健康传播研究中较少关注的历史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史和话语史的澄清，我们现代对于健康以及健康传播的理解，也很难突破美式实证主义的窠臼，无法在中国历史社会语境中发现健康传播的理论和思想潜力，这正是本文的最初出发点。

## 二、“健康”话语的源起：中医经典的观点

“健康”一词在古汉语中是分开使用的。《康熙字典》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对“健”“康”二字的用法。在《易经·乾卦》中，那句众所周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被理解为强有力的（陈廷敬、张玉书等，2008：46）。在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四》（杜亚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中，“健”也有相似的用法（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1995：1520）。在这两个案例中，“健”的内涵都有超出了一种正常状态的“强”之含义，不论是“君子自强”抑或“老而弥坚”，此种“健”之状态都超出一般人之平和的健康。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没有提及作为一种身体状态的“健”之含义，而却将“康”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健康”状态，即一种与自身和周遭环境相谐无事的正常状态。《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云“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云“凡此阳明司天之政……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周海平、申洪砚、朱孝轩，2008：797）。前者强调人体之气与健康的关系，而后者则强调气候与健康的关系，都是经典论中医整体论观念的再现。换句话说，在中医典籍中，独“康”一字就有接近今天“健康”一词的词义，而中医对健康的理解，也更多地将健康嵌入到与天地万物、四时五行的整体变化之中。可见，“健康”的话语在中医经典中被认为是一种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状态。倒是颇为接近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一个“完全”但“模糊”的理解。

“健”“康”二字的连用，在中国古籍经典中也并非绝无此例，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杂志一》“然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中用到“康健”一词，含义略同于今天的健康。而《儒林外史》第九回，也有“相别十几年，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的说法（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1995：1243）。粗察之下，这些“康健”的用

法，和今日用来形容个体的无疾病状态的“健康”一词，别无二致。笔者搜索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数据库，从1880到1950年间，以“健康”为题的期刊论文共计270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出现于1908年，是《实业报》上所刊登的一篇题为“实业新法：辨牛之健康与疾病法”的文章，而最早的以“健康”为题的书目出现于1919年，是由蒋维乔所编纂的《健康不老废止朝食论》。可见，“健康”一词的广泛运用和出现，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然则，在这些“健康”的早期用法中，“健康”一词所指涉的还仅仅是一种前现代的无疾病或正常状态。但实则近代以来，“健康”话语的嬗变却令其语义指向越来越丰富复杂。其背后包裹的不仅仅是一种针对个体的泛指的无疾病状态，却还与现代医学与医疗卫生体系兴起之后，一系列有关卫生防疫、身心管控的技术与观念相关。这些观念所形成的话语包（discursive package）<sup>[3]</sup>才是现代“健康”真正含义的起源，这种起源没有东西方文化与医学观念的碰撞是不可理解的。也因此，对此种“健康”话语的理解，成为了本文立论的一个出发点。

### 三、“健康”话语的生成语境：西医传道与中华医学会的建立

中西医疗与卫生理念的相遇得益于19世纪中后叶来华的医学传道士。1835年11月，美国公理会在华传道士伯驾（Peter Parker）<sup>[4]</sup>在广州创建“广州眼科医局”，后更名为“博济医院”（今名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西式医院，而孙中山早年也曾在这里学医（刘远明，2001：221-226）。对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医院而言，伯驾开办的眼科局顶多算是一个“诊所”。但是这个不起眼的“诊所”不仅成了现代西方医疗机构成功在地化的案例，也为日后西方医疗机构和技术大规模进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开了先例。

早在1838年，伯驾就和同事商议成立一个在地的医学传道士团体协助眼科医局的工作，这孕育了“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诞生。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协会的主要功能只是为博济医院以及后来的教会医院提供资金募集和管理协助，并为来华的医学传道士提供一个信息中介和服务的平台。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使西方来华传道士的数量迅速增长。1805—1860年间，来华新教传道士不足100人，但此后迅速增加，1864年为189人，1874年为436人，1889年约1300人，到了1905年则上升至3445人（刘远明，2001：222）。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传道士是医学传道士，传道士数量的剧增和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兴起使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组织成为要务。而且这个组织也必须具有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募捐和信息中介的平台。1887年，“中国博医会”（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上海正式成立。博医会的正式会员完全由医学专业人员构成，主要成员是来自英美欧的医学传道士。它规定：“凡正

规医学院校毕业，具有证书，服务于宗教团体的任何国籍的医师，都可以成为正式会员；非教会团体中，毕业于外国医学院校的医生只能成为名誉会员”（刘远明，2001：223）。正如刘远明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制度几乎是为医学传道士量身定做的。在博医会创立之初，医会也发布其官方的刊物——《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分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在中英美的医学界发行。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西医学术刊物。<sup>[5]</sup>

中国博医会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专业医学人士组成的全国性医学团体。中国的现代精英所接受的医疗和卫生观念，最初就是由这批医学传道士带来的。而“精英办刊”是传播此种医疗和卫生观念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博医会报》的出现，弥补了医学专业人士办刊的缺乏，为后来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健康杂志》树立了典范。然而正如Rogaski所观察到那样，中国的精英所拥抱的是西方殖民者所赋予他们的“科学现代性”的武器（Rogaski，2004）。由“卫生”和“健康”出发的话语所指向的是中国落后和匮乏的现状。与西医传道士治病救人或是借医传道的目的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医学精英们首先需要面对是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和技术所可能具有的社会意义。而在这一母题逐渐浮现之时，也正是中国社会对西医和来自西方的“殖民者”疑惧重重之时。

西方医疗机构独立于家庭与社区之外，具有封闭性，中国民间对于传道医生的怀疑和恐惧情绪也日益剧增。其中，谣言的快速出现最能体现这种反教话语巨大的传播力量。1850年前后，关于传道士“剜目挖心”的谣言就在中国南方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快速传播。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有文章介绍基督教传道士会剜走生病或将死的中国人的眼睛，并用白布盖住尸体以掩人耳目。谣言通常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天朝国衰败，洋鬼子来者不少，奸淫坏事太多。……小孩子用蒙乐‘药’迷心，用小孩子眼心配蒙乐‘药’迷人”（王明伦，1984：157）；又或“教民家如有疾病，须请牧士医治，及其将死未死之际，将其亲眷撵出，以小统取其眼珠，以二膏药封其眼眶，然后任其亲属殡葬，又有孽术能配蒙汗药，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王明伦，1984：158）。这些反教话语的出现和流传正是这种中国民众对西医传道的陌生感和恐惧感的话语表征。

尽管“中国博医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西医传道士在华合法性的争议，也对推动中国医疗和卫生体系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由于在时代语境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本土医学精英的排斥，以西医传道士为主体的“中国博医会”注定无法成为中国现代卫生体系建立的领导者（陶飞亚、王皓，2014：84）。此时，一个由中国本土医学精英为主体的协会呼之欲出。早在1910年，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的伍连德博士，<sup>[6]</sup>就在上海登报征求同仁，倡议成立中国西医自己的医学

团体。之后，他又于1914年5月联络颜福庆、<sup>[7]</sup>俞凤宾、刁信德等医生，商议成立“中华医学会”。1915年2月5日，趁中国博医会在上海召开年会之际，作为中国博医会会员的伍连德，颜福庆等21位中国医生在上海一家饭店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经大会选举，颜福庆任第一任会长，伍连德为书记。学会暂借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医师诊所为临时会所（后于1925年3月搬迁至上海西藏路540号时疫医院内），并由与会者认捐300美元作为学会第一笔经费。同年7月3日，学会获得当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第一个中国本土医生为主体的全国性西医协会（张圣芬等，2013）。

#### 四、传播“健康”：《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

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刊，1915年11月，《中华医学杂志》（*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创刊。该杂志分为中英两个版本，为半年刊。由伍连德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中，刊出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以及伍连德撰写的《医学杂志之关系》和《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则》等文。《宣言书》将“中华医学会”的宗旨阐发为四条：“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药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中华医学会，1915：50）。在这四条宗旨之中，普及医药卫生是刚刚创立的中华医学会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在中华医学会之前，如博医会之类的医学团体由于其传道以及西人背景，几乎不把普及西医知识作为工作重点。而中华医学会作为中国本土西医创办的团体，他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传播彼时对中国大众还很陌生的西医知识，“以期全国之人皆知卫生之重要”（中华医学会，1915：50）。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上的发刊词中，强调了《中华医学杂志》的办刊特色。

“本医学杂志尤有五大特色存焉，一，以中西两文编辑，凡有重要问题互相翻译。新得旧知不虞阂隔；二，各杂志多工词藻，竞尚高深，非淹达之士类难尽解。本杂志则惟就通常浅文字，务使稍具普通学识者即可一目了然；三，中国医学凝滞全系执拗中医为其魔障。有此杂志日为浸润而陶铸之期，可风气渐开，得以提携而共进；四，年来各省痨病瘟疫蔓延不绝，均由防范无方。今假杂志砭针而警告之，自可辅助警官俾知施行而设备；五，同业藉以交换知识，互相观摩，共跻民国于健康。”（伍连德，1915：1）

“共跻民国于健康”作为办刊的终极目标被明确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发刊词中，伍连德希望将《中华医学杂志》办成“就通常浅文字，务使稍具普通学识者即可一目了然”的刊物。此愿景说明本土的医学精英不仅仅将现代的卫生和医疗视作精英

垄断的资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能够向普通大众传递的知识。将医学和卫生常识“传播”的愿望是传统中医和西医传道士都不曾秉持的理念，却成为这些本土医学精英建构中国现代卫生体系的一个必由之路。“健康”成为传播这些理念一个必不可少的话语中介被反复强调。

《中华医学杂志》毕竟是医学团体内部专业性较强的杂志，在日后的实践中，中华医学会传播“健康”的历史任务，是由《中华健康杂志》接手的。《中华健康杂志》是一份医学科普类刊物，其历史虽然只有短短12年（1939—1951），但它在医学现代化早期阶段有着很特别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份由中华医学会公共医学委员会主办的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相似，《中华健康杂志》是中国这一时期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的医学团体所主办的普及性杂志。其主要的作者群体都是彼时中国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中西医学家。

其次，它所面向的不仅仅是医学团体内部或者是医学专业工作者，还包括具有一定知识和教育水平的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迫切地需要从某种渠道获取关于身体、疾病与健康的信息，而《中华健康杂志》是当时少有的此类刊物。

最后，它在出版发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医学会官方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由于《中华健康杂志》采用自负盈亏的模式，所以杂志也会刊登大量的医药类广告，图文并茂，是中华医学会系列刊物中可读性最强的一份杂志。

《中华健康杂志》创刊于1939年8月15日，总编辑由时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方医生担任。杂志为双月刊，定价2角。该刊作为中华医学会附属的杂志，其主要宗旨为提倡民众卫生、普及医药及防病保健常识。除有医学专家撰文，也面向社会征稿。在《中华健康杂志》发刊辞《本刊的愿望》中，总编辑黄子方提到欧美卫生事业的成果使得他们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新生儿死亡率大幅降低。

“一方面当然是因政府能利用科学的发明，竭力改良环境卫生，设立医疗机关，提高人民经济程度。最重要的一端，实是卫生教育的普及……同仁等以为我们如欲改善民生，富国强族，则民众卫生教育的推进，不容忽略。”（转引自张圣芬，栾伟伟，2011: 228）

《中华健康杂志》从办刊伊始，就有别于《中华医学杂志》或其它医学杂志，其目标是做医学普及，而非仅仅在医学专业群体内部分享知识和成果。杂志希望面向不具有西医知识的普通大众传播现代西医的观念和知识。也因此，它的风格和内容便不像《中华医学杂志》那么严肃和专业化。在栏目设计上，并不严格按照医学类目将文章分门别类，而是根据普通读者的需求对文章进行分类。在一份《中华健康杂志一卷一期至四卷

六期》的目录中可以看到,《中华健康杂志》的常设栏目除了有卫生健康、疾病医学、营养、妇婴等一般栏目之外,还会设立体育、史话、儿童园地、卫生故事、卫生戏剧和音乐歌曲等栏目,发表的文章也有诸如《戏剧的故事》《王子的病》《放足歌》等富有趣味的题目。看上去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在版面安排上,《中华健康杂志》还注重图文并茂,以吸引读者(见图1)。

“为了使封面更加吸引读者,杂志邀请画家肖淑芳专门为杂志绘制封面作……1942年又举行了征画活动,征集‘趣味浓厚’,以健康或卫生知识宣传为主题连环画作。同时为是和读者需求,先后编发营养、肺结核、性教育、幽默专号。”(转引自张圣芬,栾伟伟,2011:228)



图1 《中华健康杂志》封面图(图片转引自张圣芬等,2013:76)

和许多当时风靡街巷的民间小报不同,虽然《中华健康杂志》是面向大众的刊物,但是其稿件非常强调专业性,除了作者大多是接受过完整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之外,杂志所选稿件都经医学专家审阅,杂志还设特约编辑,由当时的著名医学家受邀担任。在一段时期内,《中华健康杂志》的确获得了一定影响力。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全国各学校统一采用《中华健康杂志》作为卫生科参考用书。高峰期,《中华健康杂志》是中华医学会系列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达到了5000份<sup>[8]</sup>(张圣芬、栾伟伟,2011:228)。然而,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华健康杂志》还是在经费、人员以及读者群等问题上出现了困境。虽然减少篇幅后坚持出版,但到了1951年,《中华健康杂志》还是由于中华医学会本身的变化和办刊方针的调

整停刊。在创办的10余年间,《中华健康杂志》秉持的理念是“提倡民族健康,灌输卫生常识”。在这样的一个办刊方针的指导下,《中华健康杂志》在两个方面有别于《中华医学杂志》。

其一,《中华健康杂志》是一份健康卫生知识普及性刊物。博医会也好,中华医学会也罢,是没有在中国主办过此类刊物的。其性质注定杂志刊载的内容不能是艰深晦涩的专业知识,而必须贴合彼时中国社会和大众的需要以高效地传播医学卫生话语。

其二,与《中华医学杂志》在专业群体内部流通不同,《中华健康杂志》以普通中国大众为主要受众。但是彼时,来自西方的现代健康卫生知识和理念对中国大众来说还显陌生。因此,《中华健康杂志》比《博医会报》或《中华医学杂志》都更需要阐释清楚健康卫生的意义及其与个体、家庭、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相关性。

## 五、“勾连”民族主义:锻造“健康”的话语共识

Burbick(1994)研究美国1820—1880年间的健康叙事时指出,在19世纪,刚刚独立的美国需要一种能够被公民所共享的话语方式。这种深受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影响的话语方式,他们称作“常识”(common sense,又译“共识”)。与汉语含义略有差异的是,常识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易于获得或者大家知道的知识,而是一种能够和公民分享的知识。所以在这里,常识和“共识”同义。正如Burbick自己所言:

“作为对怀疑主义和过度的形而上学的反抗,常识坚持感官知识也是通达某些自明真理的有效指引,而且这种感官知识天然地包含判断和信仰……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常识是被共享的。权威给予个人以权力正是因为常识的此种共享性。当一个个体进入社会,常识就会将他/她的权威激活。”(Burbick, 1994)

Burbick的研究回答了在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面临挑战时,什么样的知识和话语能把社会和公众联系在一起。什么样的权威能够在这个联结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相似的挑战和问题也同样困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医学的东渐标志的是一种科学理性为主导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本土精英也希望能够通过办刊来推广作为普世真理的“现代医学”。然而正如杨念群(2006)所观察到的那样,西医空间的移植和观念的传播伴随着的是中国普通百姓强烈的疑惧。此种疑惧既是对来自西方陌生事物的合理怀疑,更是对殖民主义全方位侵扰中国传统生活的反抗。因此,如何锻造一个能够被普通中国民众接受的话语共识,以推广这些被认为源自殖民者的医疗与卫生理念成为摆在

中国本土医学精英面前的当务之急。

在20世纪初，能够成为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共识，是民族主义。据王柯的考证，最早开始在中国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是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对于民族主义对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他进一步阐述道：

“凡国而未经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之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尤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sup>[9]</sup>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将民族主义想象为建立现代国家的理念起点。尽管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以对“亡国灭种”之危机以及民族崛起为主轴的道德话语成为20世纪初的知识精神所普遍认同的共识。梁启超将民族主义视作对抗西方殖民势力的积极武器。而培育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观念，成为彼时启蒙知识分子所汲汲之业也。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些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对民智未开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却是过于费解与抽象。而民族主义或其变种爱国主义却容易被一般大众所接受。一时间，民族主义也成为最可能以及容易向大众传播的话语共识。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上，陈独秀撰文阐述了他心中爱国主义的内涵，他说：“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陈独秀，1916：123）在陈独秀看来，这些固有陋习成为中国人在面对西洋文明时所抬不起头之处。而重振民族精神，无疑需要革除敝陋，行文明坦途。凡此种种思想，正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所推崇之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在陈独秀所提出的改良之道中，他特别提出六种新道德的关键词：勤、俭、廉、洁、诚、信。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些道德要求更多地指向个体的内在精神和品格追求。但是在陈的话语中，除了内在的道德要求外，这些新道德的关键词也有其表层指向。其中，与卫生相关的就是“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是以爱国志士宜身心俱洁。”（陈独秀，1916：126-127）

在此段引文中，陈独秀将公共卫生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是具有双重张力的话语。对于此类说法的话语意义的考察，我们需要借用霍尔（Stuart Hall）所提出的“勾连”（articulation）<sup>[10]</sup>概念加以考察。“勾连”是霍尔文化研究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借由“勾连”的概念，话语、文本可以与其所在的语境及其他话语资源相互关联。霍尔将“勾连”定义为：

“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元素连接起来的形式。这种连接并非总是必须、被决定的、绝对或本质性的。我们必须问，在什么情境下，这种连接可以实现。所谓的话语的同一性正是不同甚至迥异的元素的‘勾连’。这种元素间的勾连完全可以被重构因为他们相互并不必然属彼此。重要的统一性在于被‘勾连’的话语和在特地历史条件下将元素‘勾连’起来的社会权力。”（Hall & Grossberg, 2015: 116）

“勾连”的英文本身有发声表态之意，这就引出“勾连”的第二层含义，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发生表态，必须与时代精神之脉动相“勾连”，以生产意义。这种“勾连”的形构，就是话语实践的本质。权力的运作方式决定“勾连”和话语形构的方式，这个过程常常因为权力的竞合与博弈而相互拉扯。“有如英国乡郊寻常家庭的一部小型运货卡车，车头是引擎所在，后边扣上货卡，车头与货卡恒常扣住，但也可以脱钩解扣，‘勾连’新的拖车”（马杰伟，2014：31）。霍尔将“勾连”视作一个将话语和意义相互连接的“复杂结构”。由于相互勾连的话语要素并不一定基于相似性或接近性，因此勾连的可能和强弱其实取决于被勾连的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用霍尔的话说，就是“统治与屈从的关系”（霍尔，2015：116）。话语本身的意义取决于话语如何与其他话语和意义向勾连，而这些话语意义要素又来源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实践，因此，“勾连”即意味着将话语与其所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实践做嵌入式的分析。

《新青年》是20世纪初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办刊的典范。在上述引文中，陈独秀使用双重的话语勾连以阐明爱国主义的意义：第一层在于将国家的兴衰和文明的普适道德做勾连。借用福柯的概念，这层勾连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式认识型（抑

或知识型)的变化。所谓知识型,在这里指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的科学民主和不同于经典儒学的全新知识形态涌入时,获取信息和知识模式的一种全新变化(福柯,2001)。卞冬磊曾经以《时务报》的兴起为例,探讨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型转型的语境下,“时务”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现代知识的意义,并在过渡时代,作为模糊话语,兼顾旧文人的认识方式和新的知识形态共存的话语意义(卞冬磊,2015:209-233)。于此类似的是,“精英办刊”是一种现代实践,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现代报刊传播现代性的理念与源自西方的“先进”科技。此种理念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有所萌芽,但直到20世纪初,“师夷长技”与“文人办刊”的联系才显得越发清晰。

因此,第二重的话语勾连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将爱国主义与“卫生”的勾连是一个有趣的隐喻。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西方列强对中华大地的蹂躏导致了“东亚病夫”话语的出现。苏珊·桑塔格说,“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苏珊·桑塔格,2003:87)。这是疾病超越个体存亡之后常常会被勾连起的隐喻。疾病与家国孱弱的话语勾连让中国的医学精英们看到,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他们在中国推行现代医疗与卫生体系的话语助力。因此,“卫生”与民族主义的话语勾连成为这些本土医学精英在政府和国家层面游说的话语武装。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要理解一个总体性的卫生规划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却显得颇为费力。而公共卫生的推行又必须有底层民主的积极参与,因此,一个关联于总体的“卫生”概念而又能呼应传统中国的个体身心和谐的“健康”观念,正呼之欲出。

## 六、“健康的红利”:“健康”传播的现代性意义

在《中华健康杂志》发刊词的末尾,黄子方医生说到:

“同人等以为我们如欲改善民生,富国强族,则民众卫生教育的推进,不容忽略。遂而不揣固陋,久思发行卫生刊物,以为灌输民众卫生常识的一助。……我国今日正在亟于建设的时候,卫生教育尤为刻不容缓之事。所以不顾一切障碍,决意把这中华健康杂志献诸于世。”(黄子方,1939:5)

黄子方所指的“常识”概念,在今天很多的确已经成为“常识”。比如郑德涛在杂志1939年第2期上,提出健康的十二条要则(睡眠、饮食、姿势、运动、休息、大便、口腔卫生、沐浴、衣服、传染病、习惯、心理卫生)。这些在今天人看来没什么稀奇,但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头一个世纪,这些有关日常健康和卫生的观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陌生。因此“灌输卫生常识”不如说是这些本土的医学精英“传播健康知识”

和“构建健康共识”努力。在《祝中华健康杂志诞生并论我国民族健康》一文中，金宝善医生提出：“卫生教育，是一切卫生工作的基础，其目的在使人人不但知道，并且理解和实行卫生的原则。”（金宝善，1940：7）而对彼时的本土医学精英来说，卫生教育的一个核心就是“健康”之观念。因此，金宝善在黄子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中华健康杂志》的办刊宏旨：

“中华健康杂志，以普及灌输一般卫生知识，增进民族健康，厥旨甚伟，收效必宏。愿就国人健康情形，加以检讨，俾咸晓吾族积弱之真像，共知懍懍策勉，使吾民族日即于健康之途，则复兴之基，实肇于是。”（金宝善，1940：4）

金医生所谓之“民族健康”，是“复兴之基”。这种将健康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勾连，将原本与个体相关的“健康”之观念，扩展至民族层面，这种话语勾连即是本土医学（知识）精英的主动创造，也标志着一种迥异于传统话语的现代“健康”话语的滥觞。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人对健康普遍有着宽泛而模糊的理解。经典中医对于健康的描述也多集中于将“健康”阐述为个体自身或个体与周遭环境的和谐状态。然而，在这些本土医学精英这里，“健康”的话语意义绝不能仅仅限于个体的“和谐”，而需要更为宏大的话语叙事的承载。民族主义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首选话语要素。个体的健康与民族强盛的关系在李维钿撰写的《健康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得到了阐明，他说：“我国同胞真是太过不注重健康了，这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现代的国人的不努力实占一大原因。因此我们至今仍有极多衰弱颓废的国民，而国家自然难于进步或强盛。国民的素质健康可说是国家的基础，假使国民各个骨瘦如柴，不见得能为国家出力吧！国家的强弱，并不能以经济或军备为评价，实应以国民的健康为第一条件。”（李维钿，1941：23）将个体健康与民族强盛相“勾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卫生版”。在这一话语勾连中，隐含了许多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性和殖民危机的隐喻。James Pusey（1983：201）曾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如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慢慢意识到中国在武器方面落后。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现在，梁启超和严复指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学者也是落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整个文明都是落后的——因为中国的祖先是落后的。这种失落也许比19世纪的西方人在后达尔文时代失去对祖先信仰的‘宗教信仰’更加具有创伤性。”（李红梅，2016：91）

在本土医学精神的眼中，“健康”的匮乏就是这种文明失落之创伤的集中体现。而民族主义的传入，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王柯：2015）。民族主义最初的引进，并非简单的对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而是借用民族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行建设国民国家之实。而现代国民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医疗和卫生体系的重视。因此，提倡一种现代的，基于科学理性的健康观，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所认为的拯救民族于危亡，建设现代国民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1940年第2卷第2期中，陈衡哲发表了《心理健康与民族活力》一文，文章开篇就用比喻的手法勾连起健康这一关键词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他写到：

“我且先来讲一个故事。在地球的东角，有一块肥沃的平原。有一年，这平原忽然枯槁起来，从前一碧千里的葱茂情形，也变为草枯花落的一片凄凉景象了。大家起初都很诧异，但不久便发见了这平原枯槁的原因；原来从前滋养他的那股泉水，忽然在山中拥堵起来，因此便不能流到这平原上来了……这个比喻是很浅显的，那平原当然是中华民族，那枯凋情形当然是他目下的衰落，但那一股泉水又是什么呢？依我看来，一个民族的兴衰，表面上或许是系在经济与政治的各方面；但在实际上，则一个民族生活力的来源，却是他的康健——康健的体格，康健的智识，和康健的情感，而尤以最后的一项为诸种康健的总渊源。”（陈衡哲，1945：5）

比喻、类比这样的修辞方式将“健康”比喻为泉水，将枯槁的平原比作中华民族，由此，“健康”与民族的关系显而易见地被勾连起来。勾连是常识性的实践，原因在于两种话语要素的勾连常常是能够被一般理性所理解的。当然，因果性话语在医学专业话语中并不少见，但是将两个关系较远的要素通过比喻的方式“勾连”的话语策略，却并非讲究科学合理性的专业话语所常用。然而，在以“灌输卫生常识，提倡民族健康”为目标的《中华健康杂志》中，这样将民族主义与“健康”勾连的却并不少见。这种勾连的话语甚至不仅仅出现在《中华健康杂志》创刊初期，在其中后期，“民族健康”的母题也时常回响。在1947年《中华健康杂志》举办征文活动中，获得第一名就是题为《我国民族健康问题的检讨》的文章。作者华嘉增由古论今，从古典的“病弱”审美与多愁清高的人生哲学谈到现代的健康问题，他说：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大概就因了她古老的环境，把人民一个个都养成如此的柔弱多病；病弱限制了我们许多的活动，妨碍了国家的进步。但老天爷偏又赐给我们这种乐天的观感，把人生看得那样的透彻轻松，不以病弱为累，

反教我们怎样的以冷静的眼光来欣赏它，因此病弱多愁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美的最高境界。病弱该是诗人文士的本色，因病增愁，多愁的作品才是大众所最欣赏的。病弱的政客方能显出鞠躬尽瘁效劳国家的忠诚。士大夫能带病延年，才是表现出他与世无争的清高。够得上称美人的，更是离不了病，西施的‘捧心’及林黛玉的‘多病’，便构成了民间二大最合理想的美人。由这种人生哲学的熏陶，中国一向就未曾察觉到病弱的严重性。没有人把人民健康重视过，于是各种疾病由传染或遗传渐渐的蔓延到整个的中国……人民的身体日趋衰弱，国势亦日益不振，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并不曾因着历史的悠久，而得占光在先，想来怎不令人伤心！”（华嘉增，1947：4）

华嘉增的这段话有着两层重要的话语意义，首先，他所勾连的个体健康与国势衰落的话语正是《中华健康杂志》创始之初，本土医学精英所力推的话语意象。这篇征文对这一话语意象的再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土医学精英话语策略之成功；而更重要的第二层话语在于，“健康”扎扎实实地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意象。“健康”成为区分中国传统以“病”为美的观念和现代以“健康”为优之观念的话语节点。中国古典的病弱审美所提倡的“病弱多愁”正是现代健康观念的对立面，或是现代“健康”的他者。由此，“健康”话语背后所隐含的不仅仅是一套基于在地语境的民族主义呐喊，也更是本土医学精英所力图效仿欧美诸国，并在中国构建的“科学现代性”的表征。

中国本土的西医学家之所以推崇“健康”话语的“社会意义”，在于其话语背后所隐含的不仅仅是有关“健康”的医疗卫生常识，更在于“健康”具有可以向中国普通民众推广的“社会价值”。此种社会价值就是科学现代性之于现代中国的价值。也因此，在《中华健康杂志》中以健康为主题的文本中，有大量关于欧美健康经验的推广，比如《健康之道在欧洲》《英国健康保险与医药护理》以及《一个美国城市健康教育的摘要》等文章，都是力图将欧美诸国的公共卫生经验加以译介和推荐的文章。在《健康之道在欧洲》一文中，作者余新恩做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日光照亮欧洲，也照亮中国；同样的太阳，月亮，及空气。但为什么我们的体例不如人？不为什么，只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不站在健康之道上。我们不需要劳力自有衣食，不需自动，就会到达目的地，那么我们还要肌肉来做什么？至多运用手指肌肉在家里又叉麻将而已。欧洲人是命苦，社会制度及日常生活迫得他们要自己劳力才得衣食，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一经成年，父母不再抚养，就得自食其力，各自谋生，于是不得不劳力操作，因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倒站在健康之道上面去了。”（余新恩，1941：2）

在这一段话语中，作者将中国和欧洲作对比。“我们不需要劳力自有衣食”和“社会制度及日常生活迫得他们要自己劳力才得衣食”并非事实呈现，而是服膺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之中。中国人并非自古不劳而获，欧洲也非勤劳致富的典范。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意义上的劳动更多是一种对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大生产”的话语表征。鲍德里亚曾经充满洞见地指出，劳动、生产以及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它实际的话语意义。正如他说的那样：“在原始社会，既不存在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生产，同样没有辩证法和无意识，这些概念只能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这个社会被政治经济学所统治。”（波德里亚，2005：31-32）换句话说，余新恩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劳动”概念所表征的正式这种前现代的生产与现代生产之间的分野。欧洲通过“自食其力”站在了健康之道上，而余所呼吁的正是让中国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效仿西方，走向现代健康的康庄大道之上。“健康”在这里成为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话语分水岭。也因此，除了民族主义的呼吁，中国近代医学精神所建构的一个隐秘话语，正是与“健康”相关联的“现代性”话语。

在《中华健康杂志》第2卷第2期中的一篇题为“健康的意义与金钱价值”的文章中，赖斗岩医师在结尾中写到，“健康是有红利可分的”（赖斗岩，1940：10）。他所谓的健康的红利，是指西方各国投入公共卫生事业以及民众卫生教育之后，显著降低了民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使“所分的红利，超过原来卫生经费六倍之多”或“一年内工人的死亡率降低千分之三，公司成本减轻六分之五，而生产比前增加九倍”（赖斗岩，1940：10）。赖斗岩医师对于健康的理解，暗合了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医疗技术和卫生体系的发展对生产力之促进意义。此种意义，是传统社会中未能高效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巫术和游医所不具备的。正如赖斗岩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

“‘健康’两字西文为Health或Hygiene，系从古代希腊健康女神之名Hygenia而来。吾国人民，多以为“健康”就是“无病”之称。此种见解，未免过于消极。美国学者威廉氏（J. F. Williams）曾谓：‘健康能予个人以最丰富之生命，同时与社会以有最大之贡献’，上列定义，赋有积极性，极为确切。”（赖斗岩，1940：9）

“健康”被理解为个体的无病是一种传统话语的延伸，然而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本土医学精英来说，这样的理解无助于他们建立一个基于卫生合法性的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健康”，最大的话语意义正在于能够通过对“个体健康”的呼吁，让一般民众意识到个体与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连接。因此，对于“健康”的追求不仅仅具有“个人红利”，也同样具有“社会乃或国家红利”。于是，将“健康”的意义与一个现代国家卫生体系的建设布局相勾连，就是“健康现代性”的内在应有之义。

吉登斯曾经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制度性维度就是“在民族国家中发展出来的行政管理行的协调性控制水平”（吉登斯，2000：51）。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这种二元结构的出现是由于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飞跃造成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对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意义巨大。如果没有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会有现代公共卫生体系这回事。在《中华健康杂志》1939年第2期《都市生活与公共卫生》一文开端，作者即提出了一系列城乡二元比较的问题：

“都市的生活合卫生呢，亦或是乡村的生活合卫生？住都市的人疾病多呢，抑是住乡村的疾病多？住都市的人性命短（死亡率高）呢，抑是住乡村的人性命短？要明了这个问题，应先探讨都市与乡村和卫生的关系。”（编者，1939：1-2）

在以“卫生”以主轴，引出城乡二元的话题之后，作者给出了答案。

“平均起来说，住乡村的人民寿命，比住城市为高；然而近年来，科学进步，卫生改良，死亡率的减少，在城市较在乡村为速……八十年前，英美各国乡村人民的死亡率，不过城市死亡率的一半，自公共卫生科学昌明，卫生设备改善以来，城市卫生的进步，疾病的减少，死亡率的减低，较诸乡村迅速多多，是以近年来，在英美及欧北各国，城市与乡村的卫生效率，渐趋一致。”（编者，1939：1-2）

在这一段话语中，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类同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比。在前现代，科学未曾昌明，医疗技术尚未发展的时期，乡村拥有“健康”的优势，然而进入现代以来，卫生和医疗技术的改善令乡村的“健康”优势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健康”水平稳步上升，从而与乡村持平甚或超越。这里隐含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话语图景中一个持久的话语母题，那就是“科学进步”为代表的现代性之于民族崛起的重大意义。而“健康”就是嫁接这一意义的话语要素之一。换句话说，“健康”正是民族主义与科学现代性之间的话语中介。

## 七、结论与讨论：“健康”作为民族主义与科学现代性的中介性话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对这些问题做部分回应。以中华医学会为代表的本土医学精英大多在西方或受过西方的医学教育。《中华健康杂志》

第一任主编黄子方医生就曾经受训于香港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现代西医观念和技术在中国的重要推广者。<sup>[11]</sup>民国成立之后，这些本土医学精英大多在卫生相关的政府部门任要职，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民国政府构建现代国家所必须的医疗和卫生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近代中国的构建绝非自上而下的一日之功。让深谙千年医学传统的普通民众了解甚至接受一个迥异于传统中医的医学形态，需要长期的公共卫生教育的协助。雷祥麟曾研究了始于1920年代的废除中医提案（雷祥麟，2014）。在此之后，中医学家致力于“科学化”中医的理念与实践，推动中医与国家的结合，使得中医在与现代科学的冲突之中得以保存。尽管被斥责为“非驴非马”，但这些中医学家成功地将中医融入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目标之中（Lei，2014）。与之类似，尽管略有别于中医的历史地位和局限，这些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的本土医学精英在与国家的政治目标结合的过程中，却也不遗余力。然而，与中医有着广泛的本土基础不同，西医的理念和实践如果没有本土民众的支持，在国家层面也将阻力重重。尤其对有着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目标的西医学者们来说，建构一套有助于推广现代医学观念并应和国家独立和现代国家建设这一政治目标的卫生话语，势在必行（杨念群，2006）。因此，“健康”这一既取材于中国传统医学又有别于传统医学理念的话语应运而生。而《中华健康杂志》就是承载这一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中华健康杂志》的出现，显示了中国本土医学精英向普通民众传播公共卫生话语的迫切愿望。但是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承载这一愿望，是彼时的本土医学精英所汲汲之事。

曾有学者指出，近代医学化的进程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起初医学的目标是为了“确保健康的劳动力和士兵。之后，医学化进程为政府所干预，这种生活的医学化转变为医学的政治化，成为民族国家竞争的产物”（张大庆，2015：22）。在中国，这一医学化的进程比欧洲晚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其政治化的目标却有相似之处。现代医学是西方殖民者的舶来之物，但是对中国的知识精英来说，却是建设民族国家可资利用的重要“武器”之一。

“健康”的话语取材于西方公共卫生的理念，然而对于深谙中医理念的中国民众来说也并不陌生。但是，传统中医中的“健康”观念多指涉日常个人生活与养生之道，与国家的政治目标并不相关。于是，将“健康”与更为宏观的话语勾连，成为本土医学精英实现政治目标的必要话语策略。“民族主义”即是在彼时语境之下，最能唤起中国一般民众国家观念的话语。也因此，“健康”与“民族主义”的话语勾连成为20世纪初本土医学精英在传播公共卫生知识时所主动建构的话语形构。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20世纪初身处殖民主义和现代化夹缝中的中国所推崇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健康”话语所连带的医学所表征的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所孜孜以求的科学现代性。正如福柯所言：“意识形态不排斥科学性……一个话

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谬误、加速自身形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福柯，2007：207-208）“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在今日看来是不相容甚至冲突的两种话语，前者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坐标，而后者所标榜的是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科学普适主义。Latour也曾经指出现代性肇始于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以及科学与政治的对立（Latour，1993）。而本研究发现，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民族主义”与“科学现代性”却奇妙地与“健康”话语勾连，尽管他们可能处于勾连光谱的两端。雷祥麟的研究发现，1920年代之后，中医学家“科学化”中医的努力，令他们成功地开辟出了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雷祥麟，2014）。事实上，当我们回看“健康”话语之于现代中国以及本土医学精英的意义时，也同样发现了类似的中介作用。

“健康”话语成为勾连“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重要中介性话语（mediated discourse）。这一中介性话语对20世纪初那些接受西方教育，希冀通过现代医学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本土医学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话语重器。在福柯那里，话语/传播关系是权力实践的重要工具（Foucault，1982：777-795）。他将这种权力与话语勾合称为“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在这个政权里，真理是“一个生产、规制、分配、传播以及操控话语的有序系统”（Foucault，2004：334）。在福柯看来，“真理政权”是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在本研究中，近代“健康”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形构也是本土医学精英所主动生产及传播的“真理政权”。这一政权的政治功能在于本土医学精英力图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获得公共卫生话语的掌控权。换句话说，“健康”话语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话语中介，正是因为传播这一观念的本土医学精英最有资格成为“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双重代言人。而这也是本研究对福柯话语权力谱系学的一种当代印证。

最后，本研究对于现有的健康传播研究有着批判的反思性意义。健康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的一个热门分支领域。在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然而主流的传播学研究过于依附美国的实证主义范式，此种范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缺乏反思，将“健康”视作理所当然的传播目的或效果，而无视在差异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健康”可能具有多元意义。所以常常导致对“健康”的理解只见其流，不见其源。本文通过对“健康”话语和观念的近代变迁与意义阐释，试图打破实证主义的健康传播对作为目的和效果之“健康”的狭隘理解，重塑“健康”话语本身的多义性和“健康”传播的理论想象力。

注释：

- [1] 黄子方, 1899年7月4日生于福建厦门。1917年考入香港大学医科, 两年后前往美国, 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 1921年获得该院生物物理学学士学位, 1922年获卫生学和细菌学理学硕士学位, 192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 受聘为北京中央防疫处技正, 任职4年, 并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北平特别市卫生局长、卫生部参事、国际联盟卫生组委员、京沪杭甬铁路总局总医官等职。1934年4月, 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原主席李廷安请辞, 中华医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改推黄子方为该委员会主席; 1937年4月当选为首届公共卫生学会副会长(会长为伍连德博士)。参见张圣芬, 栾伟伟. 民国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J]. 中华医史杂志, 2011(4), 第227-230页。
- [2] 根据笔者考证, 早于《中华健康杂志》, 尚有《时事新报》副刊《生命与健康》(1925-1927)曾在上海出版, 卢施福任总编辑。
- [3] “话语包”的概念参见Pan, Z., Lee, C.-C., Chan, J. M., & So, C. K. Y. "Orchestrating the Family-Nation Chorus: Chinese Media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3 (2001), 331-347. 在本文中, 话语包指的是与观念话语相关的一系列话语, 他们共同建构起了一种观念话语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意义。
- [4] 伯驾, 1804年6月4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民家庭, 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并获得神学与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受美国长老会的委派, 远渡重洋, 经澳门到达广州。1835年11月4日, 在新豆栏街丰泰行7号建立了“广州眼科医局”, 又俗称“新豆栏医局”, 为广州当地的病人医病。这个医局后由另一位著名的西医传道士嘉·约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新组建, 更名为“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成为中国西式医院的鼻祖。参见刘远明.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M]. 广州: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9, 第120-121页。
- [5] 参见梁碧莹. 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3), 第1-18页; 刘远明. 中国近代医学社团——博医会[J]. 中华医史杂志, 2001(4), 第221-226页; 陶飞亚, 王皓. 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 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J]. 历史研究, 2014(5), 第79-95页; 李亚丁. 博济众生、惠爱万人的嘉约翰医生[J]. 大使命, 2014, 总第113期, 第30-33页。
- [6] 伍连德(1879-1960), 为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 出生并居住在马来西亚, 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后在槟城行医。1907年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 回国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在1910年便登报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不久东北肺鼠疫大流行, 仅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就达39679人, 清政府惊慌失措, 经外务省施肇基举荐, 1910年12月9日, 清政府委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 赴东北领导防疫工作。由于在领导东北鼠疫防疫工作上的成就, 他被清政府授予协参领, 并获二等双龙勋章。参见袁桂清等. 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出版史[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3(5), 第580-586页, 以及张圣芬等编. 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M]. 北京: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13. [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
- [7] 颜福庆(1882-1979), 上海人, 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9年获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14-1927年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并任校长, 1927年调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1927年在上海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并任院长。1938年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1940年辞职。1942年重返国立上海医学院沪部工作。上海解放后一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时33岁, 任期1915年2月-1916年2月。参见张圣芬等编. 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M]. 北京: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13. [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 20170605.
- [8] 1940年左右, 中华医学会共出版五种刊物, 除了《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和《中华健康杂志》之外, 还有刊登全国医师姓名、住址及卫生机构、医院、医校、医学团体等信息的《中国医界指南》以及关注上海本地医界信息的《上海医事周刊》, 高峰期《中华健康杂志》的发行量达到5000份, 而其他杂志从1000份到3000份不等。可见, 就对广告商的吸引力来说, 《中华健康杂志》在当时的中华医学会系列刊物中属佼佼者。
- [9] 王柯. “民族”, 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J]. 二十一世纪, 2003(6), 第20页; 原引文见梁启超.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A].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第12-27页。
- [10] 港台也有学者将“articulation”译为“串连”, 笔者认为“勾连”的译法更贴近霍尔的本意。意即话语元素之间紧密连接又随时可以脱钩的形构状态。参见马杰伟. 悼念霍尔: 他的著作和影响[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4(29), 第25-32页。
- [11] 参见黄子方医师行述[J]. 中华健康杂志, 1940(6), 第1-2页。

## 参考文献:

- [1] 黄子方. 本刊的愿望[J]. 中华健康杂志, 1939(1), 第5页.
- [2] 杨念群. 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 Rogaski, R.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4] [清]陈廷敬, 张玉书等. 康熙字典(修订版) [Z].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
- [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 [Z].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5.
- [6] 周海平, 申洪砚, 朱孝轩. 黄帝内经大词典[Z].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 [7] 刘远明. 中国近代医学社团——博医会[J]. 中华医史杂志, 2001(4), 第221-226页.
- [8] 王明伦.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 [9] 陶飞亚, 王皓. 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 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J]. 历史研究, 2014(5), 第79-95页, 第190-191页.
- [10] 张圣芬. 中华医学会史概览[EB/OL]. [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http://www.cma.org.cn/bainian/history/2014814/1407984421261_1.html), 20170605.
- [11]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宣言书[J]. 中华医学杂志, 1915(1), 第50页.
- [12] 伍连德. 医学杂志之关系[J]. 中华医学杂志, 1915(1), 第1页.
- [13] 张圣芬, 栾伟伟. 民国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J]. 中华医史杂志, 2011(4), 第227-230页.
- [14] Burbick, J. *Healing the republic: The language of health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陈独秀. 我之爱国主义[J].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1916(2).
- [16] Hall, S., and Grossberg, 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1986):53.
- [17] Slack, J. D.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Vol. 1). Eds. D. Morley and K.-H. Chen, London: Routledge, 2015:116.
- [18] 马杰伟. 悼念霍尔: 他的著作和影响[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4(29), 第25-32页.
- [19] 卞冬磊. 识“时务”者为俊杰: 晚清知识转型与中国现代报刊的兴起(1896-1898) [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5(32), 第209-233页.
- [20] [美]苏珊·桑塔格著, 程巍译. 疾病的隐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21] 金宝善. 祝中华健康杂志诞生并论我国民族健康[J]. 中华健康杂志, 1940(1).
- [22] 李维钿. 健康的意义与价值[J]. 中华健康杂志, 1941(4), 第23页.
- [23] 李红梅.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帝吧出征事件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6(11), 第91-113页.
- [24] 王柯.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 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
- [25] 陈衡哲. 心理健康与民族活力[J]. 中华健康杂志, 1945(2), 第5页.
- [26] 华嘉增. 我国民族健康问题的检讨[J]. 中华健康杂志, 1947(1), 第4页.
- [27] 余新恩. 健康之道在欧洲[J]. 中华健康杂志, 1941(2), 第2页.
- [28] [法]波德里亚著, 仰海峰译. 生产之镜[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 [29] 赖斗岩. 健康的意义与金钱价值[J]. 中华健康杂志, 1940(2), 第9页.
- [30] [英]吉登斯著, 田禾译.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31] 编者. 都市生活与公共卫生[J]. 中华健康杂志, 1939(2), 第1-2页.
- [32] Lei, S. H.-L.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 [33] 张大庆. 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 思想史的路径[J]. 历史研究, 2015(2), 第14-22页.
- [34] [法]福柯著, 谢强, 马月译. 知识考古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35] Latour, B., Trans. C. Porte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6] Foucault, M.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1982):777-795.
- [37] Foucault, M..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uth: Engagements Acros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Eds. D. Wood and J. Medina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4:315-335.

combin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news production.

**[Keywords]** news production; transparency; blockchain

### **43 Communicating Health: Nationalism, Scientific Modernity and Construction of Health Dis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 *LI Yun-geng*

**[Abstract]** This study sets out to explore how the local medical elites proactively construct and propagate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to facilitate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the context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colonization. On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centering on "health" in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1939-1949) established by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health" deviated from its classical meaning in the Chinese medical tradition which addressed individualistic health and way of nurturing life. Health became mo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which was served as a discursive weapon manipulated by local medical elites to engage with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modern nation state building. On the other hand, as a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scientific modernity, health was managed by local medical elites to communicate and propagate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medicine in China. Thus, these local medical elites strived to construct health as a mediated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odernity. In this vein, "health" was born to imbued with the political impetus of local medical elites to steer the course of state building through the way of public health, 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ve ambition to legitimize the knowledge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refore "scientific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health; discourse;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nationalism; scientific modernity

### **6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vergence Modes of Overlapping Circles of China's Press Group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Nanfang and Zhejiang Daily Press Group**

---

• *WANG Xue-cheng, LIU Tian-l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three cases that are Shanghai United Media Group,